

陇右历史地理视域下秦人马文化探析

包茂如

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21级本科生 730070

摘要：秦人早期居于陇右地区。陇右地形丰富多样，气候四季分明，且又近于西戎。自然环境与人为因素给秦人养马提供了必要条件，使得早期秦人形成养马传统，而在这一生活实践中蕴育而出的马文化也在陇右大地上熠熠生辉。

关键词：陇右；养马传统；马文化

文化的形成，并非一时一地，而是经历了时间与生活的长久积淀。陇右地区是秦人的早期发祥地。自秦非子主马于汧渭之间、马大蕃息，此后生活在陇右一带的民众将养马事业延续下来。在这一过程中，马匹逐渐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，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。秦人养马与陇右地区地理环境、早期秦人生活传统以及西戎文化习俗联系紧密。

一、陇右地理条件与秦人养马传统

我国上古时期产马的地域主要有豫州、兖州、雍州及并州等地，《周礼·职方氏》：“正西曰雍州……其川泾、汭，其浸渭、洛……其畜宜牛、马”，雍州大致即今甘肃、陕西在内的广大西北地区，涵盖今甘肃东部秦安、礼县、渭源一带。这一地域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，在中国养马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。^[1]

明嘉靖十四年刊本《秦安志》：“地广民稀，水草宜畜牧。”^[2]明代之际，秦安地区民众稀少，水草丰茂，适宜的地理环境为养马发展提供了资源条件。1999年编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志》说：“县境内草场辽阔，牧草旺盛。”^[3]张家川县现有白嘴石和五星两大牧场，草料丰富，满足畜类饲料需求。相比于秦安、张家川等地，礼县成为早期秦人养马的核心区域。早期秦人在陇右一带主要的活动区域就在今天的礼县。这一带土地面积宽广，气候适宜，从古到今种植农业发达，动物饲料来源比较丰富，除了大量天然草场之外，还有苜蓿、农作物秸秆和糠衣等人工草料。^[4]秦安、张家川及礼县一带独具优势的地域环境利于牧草生长，使得畜类饲料充足且多样，满足了马对食物的基本需求，无疑是对养马这一产业提供了必要保障。

除此之外，养殖马匹等草食动物须秉持营养均衡的原则。不仅要重视饲料加工、维持饲料供应，保证蛋白质、脂肪以及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的吸收，还需摄入适量的矿物质。这样既可助力消化，又能促进成长繁殖。

矿物质是形成畜类骨骼与牙齿等组织的主要营养成分，虽然需求量较少，但不可忽略。而且其无法由动物有机体合成，必须通过饲料供给。按照最低标准，成年体重为200kg、400kg、500kg的马对于矿物质氯的营养需求分别为16g、32g、40g，对钠的营养需求分别为4g、8g、10g。^[5]常用饲料中往往不能满足畜体对氯和钠的需要，^[6]因而在养殖过程中，需要按照畜类品种和生长阶段，在饲料中添加适量盐分，或者专设盐槽舔食。食用适当的氯和钠，既可以维持畜类体液酸碱平衡，调节心脏活动，增强消化和免疫功能；同时也能够参与物种体内水分代谢、维持水盐平衡，以促进生长发育与繁殖。盐官镇以“盐”著称，属于甘肃省陇南礼县，位于其东北部，东接天水，西临西和，历史上曾是一座以产盐、运盐、营盐为主的商贸大镇。《水经注疏》：“水北有盐官，在岷家西五十许里，相承营煮不辍，味与海盐同。”^[7]而且盐官地表有卤水，地下有盐井，土壤富含盐分，^[8]这些条件使得地表富含矿物质且生长的植被含盐量较高。而且盐这一矿物质中富含氯和钠等元素，很好地适应了马匹的生长需求。

凡此，都为秦人养马提供了便利的条件，秦人长期生活于此，也形成了独特的马文化。

二、陇右秦人的马文化

陇右地区充满生气昂扬的马文化，其具有秦人典型的生活色彩。

首先，这是早期秦人生活传统的真切反映。秦人先祖为东方华夏部族的一支，主要接受殷商文化的熏陶与影响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：“秦之先，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”，^[9]又说秦先祖大费曾辅佐舜驯服鸟兽，费昌、中衍曾为商汤、太戊御车，而且都精通此技，“秦人善于蓄养鸟兽、长于御车，似与商王朝的关系比较紧密。”^[10]而且考古表明，秦人对于殷商时期的殉葬传统具有一定继承，如好尚人殉，这是殷商祭祀的重要特征。秦人善马好车，因此在殉葬中显示出对

车马的独特安排。“周人殉葬时将车、马脱卸，分开安置；而秦人却是将车马挽驾如常，完全以驾乘状态殉埋。”^[11]据相关出土文物佐证，“甘谷县毛家坪遗址是秦国子车氏的墓葬，发掘车马坑五座，马头和车都朝东，马在东，车在西，都在系驾的位置上。”^[12]其中三辆装饰豪华排列有序的车舆，无不显示出车主的尊贵地位。此外，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也发掘出两座车马坑。

其次，秦人对马的崇拜，应是受到当时政局形势的影响。春秋战国时期，王室衰微，诸侯征战不休，强大的军事实力决定了国家领土与人口的多少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，秦人对马的崇拜，实质是对力量与权力的追求，是对实现自身繁荣发展的强烈渴望。总而言之，无论是秦人早期生活传统还是自身对马的崇拜，都是对其早期现实生活状况的真切反映。

此外，早期秦人对马匹的使用，除了用于战争与狩猎，也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。如此，马匹便与秦人生活实现紧密联系，马文化得到不断发展，其特点具有丰富色彩：

第一，周礼文化的象征。秦人虽然生活在陇右，但其仍旧坚持学习中原王朝的礼乐制度。今《诗经·秦风》十首诗歌，其中《终南》《车邻》《驺虞》《小戎》《蒹葭》均产生于秦人居陇期间。^[13]《车邻》：“有车邻邻，有马白颠。未见君子，寺人之令……既见君子，并坐鼓瑟。”《毛序》：“《车邻》，美秦仲也。秦仲始大，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。”^[14]“邻邻”形容车前进的声音，“白颠”指额有白毛的马，即君王所乘之马，“寺人”为宫内侍臣，负责传达王后的命令。后两节“并坐鼓瑟”“并坐鼓簧”更加凸显了雅乐和谐的氛围。秦人已经注意到，只有实现军事实力与文化底蕴并重，才能实现兴国的宏大志向。

第二，勇猛尚武的精神。首先，秦人尚武精神由来已久，成为贯穿其发展始末的重要特征。秦人始祖女修吞玄鸟卵生大业，而玄鸟便是一种猛禽；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：“恶来有力，蜚廉善走”，此后柏翳能御车而行、驯服百兽，也可以体现出早期秦人的勇猛风尚。其次，陇右艰苦的地域环境，锻炼了秦人尚武勇猛的精神风貌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“天水陇西，山多林木……皆逼近戎狄，修习战备，高上气力，以射猎为先。”^[15]《诗经·秦风》中表现出的尚武精神，是秦人内心深处的美好品质：既是《无衣》怀有的秦人反对侵略、保家卫国的强大意志，也是《车邻》彰显的车马齐头并进的激情气势，更是《驺虞》《小戎》蕴涵的秦人与马并肩作战的强大勇气。

第三，光大部族的品质。周室危乱之际，秦仲、襄公等无不顽强拼搏、奋力守护，甚至付出生命。《驺虞》是《诗经·秦风》中的诗歌，《毛序》：“驺虞，美襄公也。始命，有田狩之事、园囿之乐焉”，始命者，郑笺：“始命为诸侯也。秦始附庸也。”^[16]王国维于北京古玩市场发现的秦公簋，刻有铭文“秦公曰：‘不（丕）显（朕）皇且（祖），受天命’”，皇祖即襄公，被立为诸侯。秦襄公祖父秦仲伐西戎，最终被杀；周幽王为犬戎所杀，周地大部分失陷，后来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，被封诸侯。从秦仲封为大夫、卫周身死，再

到襄公“攻戎救周”而为诸侯，历代秦君坚守保家卫国、奋发图强的抱负与使命。在这一过程中，马匹发挥了关键的作用，其作为战争利器，与秦人并肩作战、杀敌卫国，始终在实现自身发展繁荣的道路上昂扬驰骋，给灵魂赋予了奋力苦干的优秀品质。

三、西戎养马习俗对秦人的影响

陇右地区自古戎族支系繁多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：“自陇以西有绵诸、緄戎、翟、獯之戎……各分散居溪谷，自有君长，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，然莫能相一。”^[17]秦穆公时期，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：“三十七年，秦用由余谋伐戎王，益国十二，开地千里，遂霸西戎。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。”^[18]林剑鸣先生在《秦史稿》中说：“陇以西的四个戎国，大约就是西戎中主要的，而这里的‘陇以西’，主要指今天的陕西以西、甘肃的陇南及陇西广大地区。”^[19]由此可知，西戎并不单指，而是对西北地区许多非华夏部落的泛称。殷商之后，秦人迁至西垂，即今天甘肃礼县一带，且长期居于此。由于地理位置上靠近西戎部族，秦人频繁与其交往杂处。虽难免有战争冲突，但也有和睦相处。在这一过程中，秦文化与西戎文化渗透交融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：

第一，秦人尚武好战与西戎密切相关。西戎为游牧部族，居于西部内陆，马不仅是他们的生活工具，更是战争利器。秦人面临如此强劲的对手，仅凭身体素质难以抵挡马上骑兵，当然也要汲取对方作战优势，迫使其以马匹为作战工具，进而增强军事实力，铸就尚武传统。《诗经·秦风》中的《无衣》《小戎》《车邻》等诗，其中蕴含的同仇敌忾、身先士卒的尚武精神，便是秦人与戎人相处的佐证。清人马瑞辰曾说：“秦以力战开国，其以力服人者猛，故其成功也速，其延祚也短；而其敝也，失于黷武而不能自安。是故秦诗《车邻》《驺虞》《小戎》诸篇，君民相耀以武事，其所美者，不过车马音乐之好，兵戎田狩之事耳”^[20]其意义也当如此。

第二，陇右秦墓葬具有鲜明的戎族文化色彩。秦与西戎和平相处、征战兼并的民族关系，共同促进了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。马家塬墓地陪葬品奢华无比，除了应用金银于车饰、马具、人体服饰、生活器具、武器工具等秦及中原文化，也有以铲足鬲为代表的西戎因素；^[21]在已报道的马家塬18座墓中，有15座墓殉车，^[22]彰显马车在戎人心中的重要地位。西戎为马上民族，骑马驾车是适应迁徙生活的必备技能。此外，在张家川、秦安、清水发现了许多与马家塬类似的西戎墓地，^[23]如张家川县刘堡乡长沟墓地，采集到铲足鬲、漆器残片及马骨；^[24]秦安五营乡王洼墓地，发掘3座战国墓，墓形、葬俗、器形风格与马家塬基本一致。^[25]西戎善马，秦人便学习这一优势，这是其形成养马传统的重要原因。游牧民族战力的提升，马匹具有关键作用。经过与戎狄民族的不断交战，秦人汲取对方的作战优势，培养马匹，增强自己军事实力。

早期秦人具有融汇贯通的优秀品质，在与西戎交往的过程中，能够汲取对方的优势与长处，弥补且完善自身的缺点与不足。也正因为这一点，早期秦人才能战胜周边戎族，逐步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壮大。

四、后世陇右地区马政传统

地域环境造就了陇右地区利于养马的区位优势,统治者颁布政令、设置牧署,使得其一度成为发展畜牧的重地。

西汉时期,天水地区成为重要养马区域。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:“唯汉阳有流马苑,但以羽林郎监领”,^[26]汉阳即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北。汉在陇右已设养马机构,一定程度上是对秦养马机制的继承,但尚不成熟。1971年,甘肃礼县出土珍贵文物“天水家马鼎”,为汉武帝建元前后的器物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:“太仆,秦官,掌舆马,有两丞。属官有大厩、未央、家马三令……太初元年更名家马为**橐**马”,^[27]以令称家马,可知其应该是太仆的属官;颜师古对“家马”作注:“家马者、主供天子私用,非大祀戎事军国所需,故谓之**家马**”,^[28]这表明家马并非用于战争或祭祀,而主要为君主私用。太初元年改家马为**橐**马,应劭对“**橐**马”作注:“主乳马,取其汁**橐**治之,味酢可饮,因以为官。”^[29]这便说明,家马是为君主产奶之马,为实现君主饮食服务,专门设立官职。

隋朝在陇右设立畜牧机构,《隋书》明确记载:“陇右牧,置总监、副监、丞,以统诸牧。其骠骠牧及二十四军马牧,每牧置及尉、大都督,帅都等员。”^[30]诸牧署官员各司其职,以“牧”蓄养马匹,而“监”行使监察之责,逐渐形成以监统牧的管理机构。《新唐书》:“监有丞,有主簿、直司、团官、牧尉、排

马、牧长、群头,有正,有副”,^[31]唐承隋监牧制度,“监牧”发展成为系统完整的管理体系。牧监分设正、副,其下有丞、主簿等职位,各职分工明确、分统其位。

张德友《明清秦安志集注》:“秦州茶运所茶夫三十人”,^[32]下注“国家重马政,故严茶法”。茶马交易是明朝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,为垄断市场,政府曾先后在秦州、河州、洮州、庄浪等地设立茶马司,专门负责茶马贸易;“府马夫四十人,县马夫八十人”,^[33]马夫即负责管理和喂养牲口的仆役。明朝政府重视马事,颁布明文条令、专设养马职位,由喂养、交易再到管理,环环相扣、一应俱全。且明代马匹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,既有交通运输之用,又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。

五、结语

陇右地区孕育而出的“马文化”基于秦人日久形成的生活传统,同时具备了物质属性与精神属性。“马文化”不仅展示了秦人居陇期间的独特生活样貌,也成为后人效仿之标榜。历代民众皆承袭前人传统,开启后世生活。同时,“马文化”作为探析秦先民居陇生活的重要素材,对研究秦文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谢成侠:《中国养马史》,农业出版社1991年版,第17页。
- [2]胡缙宗:《秦安志》,明嘉靖十四年刊本,第32页。
- [3]安耀民,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: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志》,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,第420页。
- [4]以礼县为例,据1999年版礼县志编纂委员会《礼县志》记载,“全县天然草场144.4万亩,人工种草及农田种草85908亩;产出小麦、玉米、燕麦、糜子等农作物秸秆2312506万斤,可产糠衣142.81万斤。”
- [5]张宏福:《动物营养参数与饲养标准》,中国农业出版

社2010年版,第484页,488页。

- [6]俞联平,王汝富:《草食家畜营养及饲料加工调制技术》,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,第18页。
- [7]郦道元,陈桥驿:《水经注校正》,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479页。
- [8]张力,王苍:《礼县秦早期文化考述》,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,第90页。
- [9]司马迁:《史记》,中华书局1959年版,第173页。
- [10]伏俊琏,周奉真:《甘肃文化史》,中华书局2022年版,第124页。
- [11]梁云:《西垂有声:〈史记·秦本纪〉的考古学解读》,三联书店2020年版,第38页。
- [12]梁云:《西垂有声:〈史记·秦本纪〉的考古学解读》,三联书店2020年版,第38页。
- [13]韩高年:《〈秦风〉秦人居陇诗篇考论》,《兰州学刊》2016年第5期。
- [14]毛公传,郑玄笺,孔颖达疏,李学勤主编:《毛诗正义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,第408页。
- [15]班固: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1644页。
- [16]毛公传,郑玄笺,孔颖达疏,李学勤主编:《毛诗正义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,第411页。
- [17]司马迁:《史记》,中华书局1959年版,第2883页。
- [18]司马迁:《史记》,中华书局1959年版,第194页。
- [19]林剑鸣:《秦史稿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,第45页。
- [20]马瑞辰:《毛诗传笺通释》,中华书局1989年版,第361页。
- [21]王辉:《张家川马家塬墓地相关问题初探》,《文物》2009年第10期。
- [22]梁云:《考古学上所见秦与西戎的关系》,《西部考古》2016年第2期。
- [23]梁云:《考古学上所见秦与西戎的关系》,《西部考古》2016年第2期。
- [24]梁云,游富祥,侯红伟:《牛头河流域考古调查》,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10年第3期。
- [25]赵雪野,王山,田松亭,孙明霞:《甘肃秦安王洼战国墓地2009年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2012年第8期。
- [26]范晔:《后汉书》,中华书局2011年版,第3517页。
- [27]范晔:《后汉书》,中华书局2011年版,第729页。
- [28]范晔:《后汉书》,中华书局2011年版,第729页。
- [29]班固: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730页。
- [30]魏征,令狐德棻:《隋书》,中华书局1973年版,第784页。
- [31]欧阳修,宋祁:《新唐书》,中华书局1975年版,第1337页。
- [32]张德友:《明清秦安志集注》,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,第122页。
- [33]张德友:《明清秦安志集注》,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,第122页。